



苏联文学史

第二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联文学史

第二卷

叶水夫 主编

李辉凡 吴元迈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北京

装帧设计：鹿耀世

目 次

第 三 篇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1953—1967)…………… 3

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变化——“无冲突论”的由来和表现——1952年4月7日《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状态》与文学理论及批评——“写真实”与“积极干预生活”——错误的典型说和“理想人物论”——自我表现说的争论——1954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修改——苏共二十大与苏联文艺问题——“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会——对“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公式的批判——作家创作个性——文学特点的重新探讨——文学的审美本质——1957年反对文学创作中的“不健康倾向”——苏共二十三大与人道主义思潮——“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讨论会——“当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讨论会——苏联文学发展中的问题

第二章 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1953—1967)…………… 40

反“无冲突论”引起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的新变化——《茹尔宾一家》、《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探索者》——《一年四

季》、《在故乡城市里》——《区里的日常生活》和奥维奇金派，《解冻》——《俄罗斯森林》的突破性意义——批判“个人崇拜”在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中出现的激烈内在争论——《一个人的遭遇》和《前进中的战斗》在五六十年代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是单靠面包》、《日瓦戈医生》、《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叶尔绍夫兄弟》、《小铃铛》、《冰书》、《传说的继续》——《布列斯特要塞》、《母性的大地》、《生者与死者》、《最后的炮轰》和《一寸土》——《人血不是水》、《新垦地》第二部、《波列西耶纪事》、《冷酷》、《在额尔齐斯河上》、《列宁四部曲》、《源泉》——《感伤的罗曼史》、《查密利雅》、《审判》、《白天的星星》、《生活的故事》——五六十年代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的人道主义内涵及体裁、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

第三章 诗歌创作(1953—1967)84

表现自我和写“活生生的人”的主张——别尔戈丽茨、阿丽格尔——“永恒主题”诗歌：费奥多罗夫、索洛乌欣、鲍科夫、维诺库罗夫、加姆扎托夫——“大声疾呼”派诗歌：叶夫图申科、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卡扎科娃、奥库扎瓦——传统与革新：沃兹涅先斯基、梅热拉伊蒂斯——长篇叙事诗创作：《山外青山天外天》、《凭借记忆的权利》、《严峻的爱情》、《世纪的中叶》、《布拉茨克水电站》、《被卖掉的维纳斯像》、《血与灰烬》、《记忆的审判》

第四章 戏剧创作(1953—1967)116

《真理报》文章《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状态》与戏剧创作新转

机——《翅膀》和《人事档案》——《祝你顺利》——道德题材作品：
《内心不饶恕》、《金钱》、《飘零岁月》——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一
望无际》、《永生的人》和《寻求欢乐》、《客人》、《“阿斯托里亚”旅
馆》、《工厂姑娘》、《女鼓手》——对生活题材的深化：《彼得拉克
的十四行诗》、《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大洋》、《一切都留给人们》、
《五个晚上》、《姐姐》、《任命》、《婚日》、《我的可怜的马拉特》、
《华沙曲》、《关于爱情的104页》——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悲壮的颂歌》、《严峻岁月》、《七月六日》

第 四 篇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1968—1981)153

文学论争——《新世界》与《十月》——1967年《真理报》编辑部
文章《当落后于时代的时候》——第四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苏
共中央反对文艺领域中的“两个极端”及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决
议——苏联文学思潮的新变化——现实主义问题的探讨——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提出——苏联文学方法的多样化——
文艺的综合研究——文学系统分析方法——文学类型研究——
文学历史比较研究——文学历史功能研究——文学认识特
点的研究

第二章 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1968—1981)187

六十年代末文艺政策的新变化，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中正
面歌颂苏联历史和现实的作品增多——《别了，古里萨雷》、
《凡人琐事》、《普里亚斯林一家》——《不屈的小柳树》、《哥萨克

镇》、《巴尔宾的故事》、《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阿尔图宁三部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方尖碑》、《克拉芙季娅·维洛尔》——《热的雪》、《最后一个夏天》、《围困》——《落角》、《外交家》、《盐山沟》、《血和汗》、《西伯利亚》、《永恒的召唤》、《命运》——《六根图柱》、《岸》、《库兹涅茨桥》——政治暴露小说遇到困难，道德题材小说的兴起和发展——《走进每一家》第二部、《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和《多雪的冬天》——《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大教堂》、《鸡叫三遍之前》——《交换》、《滨河街公寓》、《爱情的历程》、《为玛丽雅借钱》、《月蚀》、《伊戈尔·萨沃维奇》——《白轮船》、《白比姆黑耳朵》、《鱼王》——小说创作艺术综合的增强和假定性的广泛运用——七八十年代之交小说及其他散文体创作思想内容上的广泛哲理性和艺术上的开放性——《矿井》、《起跑》、《一幅画》——《战争》、《永远十九岁》、《萨什卡》——《永垂不朽》、《没有战争的年代》——《老人》、《良心》——《六十枝蜡烛》——《永恒的规律》、《选择》、《一日长于百年》、《浆果处处》——《漫长的童年》、《四个浅滩》、《你的霞光》、《追思》、《和谐》

第三章 诗歌创作(1968—1981)228

“悄声细语”派诗歌：鲁勃佐夫、索科洛夫、日古林、杜金、维索茨基——传统哲理诗派诗歌：普罗科菲耶夫、马尔登诺夫、舍夫涅尔、库利耶夫、德鲁尼娜、艾敏——长诗的平稳发展：《喀山大学》、《记忆的远方》、《普罗米修斯，别扔掉火种》、《二百一十步》、《天鹅之死》、《警钟》、《斯大林格勒之声》、《尊严》、《心灵与日记》、《克拉古耶瓦茨的教训》、《理智的反叛》

第四章 戏剧创作(1968—1981)260

戏剧发展的新阶段：《夜莺歌唱的夜晚》——科技革命与生产
题材：《玛丽娅》、《外来人》、《炼钢工人》、《权力》、《来去之日》、
《一次会议的记录》、《反馈》——《验收书的签字人》、《家丑外扬》——生产题材的道德化：《走自己的路》、《至圣》、《处境》——
人的精神追求与道德题材：《等待》和《残酷的游戏》、《夏游》和
《久久等待的人》、《瓦连金与瓦连金娜》、《专用列车》、《及早行善》、
《六月的离别》、《长子》、《打野鸭》、《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
两种题材提法的相对性：《聋人之家》、《第十三任农庄主席》、《异曲同工》——
革命历史题材：《革命的探索》、《我们一定胜利！》——结束语：戏剧的“新浪潮”

第三篇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

(1953—1967)

一

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变化从来紧密相连。当代苏联文学的进程，与当代苏联社会的进程亦即以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不可分开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3年9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苏联农业的落后与困难，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措施》的决议，赫鲁晓夫在全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年8月《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和10月1日《文学报》分别发表编辑部文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社论《孜孜不倦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次抨击“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唯心主义的崇拜理论的流行”；1954年12月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距第一次代表大会已整整二十年）；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及反对“个人崇拜”等重大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正是随着苏联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这些急剧而重要的变化，苏联文学在思想内容或审美原则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可

以说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然而，任何文学中的历史性转折都不会突然发生，总要有一个酝酿、准备、渐变的过程。苏联文学新时期的到来，显然与反对“无冲突论”思潮相关。

“无冲突论”思潮由来以久，并非始于战后年代。1941年1月31日，苏联作家巴甫连柯、列文在苏联作家协会党组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曾指出苏联文学中存在着“无冲突论”的倾向：“冲突消失了，它已被偶然的和暂时的误会所代替”，“在我们这里开始形成了一种无冲突的特殊理论，把生活看得如同呼吸一般轻松，冲突变成了陈迹，”作家“害怕描写某些反面的、有害的和有罪的东西”。^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作家或用枪或用笔，或两者同时并用，参加了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在这种血与火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会有“无冲突论”思潮的市场。但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和平生活的到来，停息了几年的“无冲突论”之风，又重新刮了起来，而且越刮越烈。

为什么在苏联文学的进程中会出现“无冲突论”思潮，问题显然不象后来所追究的那样简单：谁是它的领唱人？谁是它的伴唱者？而是有着社会、理论和文艺发展本身等多方面的深刻原因。自1936年苏联宣布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渐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②后，报刊上经常宣传的是苏维埃人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完全一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等一些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生活实际的观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论述上出现了极端的“理论”，例如1940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① 《文学报》1941年2月4日关于苏联作协党组会议的报导。

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8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杂志，曾连续发表文章，断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存在前进的矛盾”，“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被排除了”，等等。这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以及在这个阶段里“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的理论，都是格格不入的。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条件下，在一国的范围内，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不太长的历史时间里就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所有这些不仅没有使苏联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和冲突不复存在，而且也未能使苏联在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于熄灭。历史对此已经作了结论。与这种否定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相呼应的是，“无冲突论”在苏联戏剧、小说、诗歌和评论中渐渐抬头，文艺和生活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很多作品不再去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对现实的缺点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似乎除“好”与“更好”的冲突之外，苏联社会中的其他冲突已经烟消云散。有的评论家甚至宣称：“我国生活中的理想和现实达到了完全一致”。“无冲突论”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同苏联文艺发展初期存在的某些似是而非的文艺观点，也是紧密相连的。十月革命后，文艺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同过去时代的文艺，特别是同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是尖锐对立的：前者肯定现实、塑造正面主人公；后者否定现实、塑造反面主人公。直至五十年代初，有些文章仍声称古典作家是“静观地反映现实”，不关心对生活的改造，没有创造出具有正面榜样力量的和充分价值的人物形象。文艺理论中的这种强烈的对比原则，不仅把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而且把肯定和批判、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相互关系也简单

化了。随着“无冲突论”的日益发展，这种简单化的做法被推到了极限，竟然出现了象“节日文学”这样无视现实的天真口号。这无异于说，作家只应该表现生活中那些甜甜蜜蜜、歌舞升平的东西。战后初期那些表现“无冲突”的小说（如《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及电影（如《幸福生活》），那些或仅仅围绕着是多生产布匹还是生产各色各样布匹的“冲突”的剧本（如《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或描写某些因工艺细节而引起的“冲突”的剧本（如《莫斯科的女儿》），被当作反映生活真实和现实主导倾向的作品加以肯定，并非偶然。作为“无冲突论”思潮的理论支柱，则是那个盛极一时的、特殊的典型说，即“典型是那些表现苏联社会的正面事物，反面事物绝不可能决定苏维埃的面貌”，或者说，反面事物是“社会主义社会一般情况下的个别现象，因而在苏联社会里是不典型的”。其结果，文艺作品不仅不去塑造反面形象，不去把批判锋芒指向落后的和腐朽的事物，而且连幽默、讽刺、悲剧这样的形式和体裁也给取消了，实际上，它们的作者也往往没有好的命运。甚至连戏剧应该描写冲突这样的常识性问题，也被斥之为“磨破了嘴皮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苏联戏剧区别一切旧戏剧的“新气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地强调写本质、写光明、写正面人物，抹杀生活本身发展的辩证法，使文艺创作越来越概念化，公式化，四平八稳，千篇一律。“无冲突论”给苏联文艺带来的种种弊端，正如后来特瓦尔多夫斯基在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中所描绘的那样：

长篇小说事先已经写好；
挟着原稿上工地吃两口灰；
再用棍子捅捅混凝土；
把作品和生活作一番校对。

一转眼，第一卷已经脱稿，
里面是要啥有啥，面面俱到；
有革新了的砌砖操作法，
保守的副主任，先进的他和她；
有在成长过程中的主席；
和第一次试转的发动机；
有惊险的情节，有暴风雪；
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老大爷；
有党小组长率领突击队；
有部长下车间，还有跳舞会……①

这表明，“无冲突论”已成为苏联文学发展的严重障碍，反对“无冲突论”已成为生活发展和文艺发展的客观需要。1952年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的著名编辑部文章，对苏联戏剧及其他文艺领域中那个杜撰的“无冲突论”首次作了公开批评。编辑部文章指出，“无冲突的庸俗‘理论’对创作非常有害”，那种认为在苏联“一切都好，都很理想，不存在任何冲突”，“全部问题都可归结为只有‘好’与‘更好’之间的冲突”是毫无根据的。这因为不仅在苏联建设者的道路上“经常会碰到障碍和困难，会碰到各种冲突和生活上的重大矛盾”，而且“新旧事物的斗争往往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生活冲突；没有冲突便没有生活，大概也不会有艺术了”。针对“无冲突论”给文艺领域造成的粉饰现实的倾向，编辑部文章进一步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揭示缺点和困难。有毛病就应当医治。我们需要有果戈理和谢德林。”几个月之后，在1952年底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总结报告

① 特瓦尔多夫斯基《山外青山天外天》第61页，作家出版社，1961年。

无法回避严峻的生活现实，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对苏联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缺点和弊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语言之尖锐是前所未有的。它同时号召苏联文学家和艺术家“无情地抨击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的现象”，“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用果戈理和谢德林的讽刺烈火“把生活中的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都烧毁”。总结报告特别对“无冲突论”的最富有代表性的论点——典型说作了剖析，认为“典型不仅仅是最常见的事物”，“典型绝不是某种统计的平均数”，典型“不仅仅是最普遍的、时常发生的和平常的现象”，“有意识地夸张和突出地刻划一个形象并不排斥典型性”。这实际上肯定了反面形象在苏联文艺创作中的应有地位及其教育作用。这种肯定对于拨开长期以来笼罩在典型问题上的迷雾，为创造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在《真理报》的编辑部文章和十九大总结报告之后，文艺界不仅恢复了三十年代初针对“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而发的“写真实”口号，认为粉饰现实，害怕表现困难、缺点和矛盾，追求轻易虚假的冲突是拒绝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表现，而且提出了“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认为作家对当代生活中一些尖锐的问题采取听之任之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同现实主义背道而驰的。“积极干预生活”口号的出现，同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是分不开的。奥维奇金在特写里以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在战后第一个展示了农村的现实矛盾和冲突，抨击了官僚主义领导不关心生产，只执行上级命令，导致形成那种“人人回避，缄口不言”的局面的东西。“积极干预生活”这个口号最初就是用来礼赞这篇作品的。“写真实”也好，“积极干预生活”也好，它们都要求文艺作品全面地描写生活，不回避生活的现实矛盾，值得肯定的就勇于肯定，应该否定的就勇于否定，其目的在于推动生活

的发展和艺术的发展。因此，这两个口号在当代苏联文学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一年之后，1953年6月9日，《真理报》又发表了另一著名编辑部文章《克服文艺学中的落后现象》，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落后现象提出了批评。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的姐妹篇，是它的继续与发展。它指出，“苏联舆论界反对虚假的无冲突论的言论，对苏联文艺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认为“文艺学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我们的文艺学家同生活的联系极为不够，他们的著作常常和当代生活的根本问题脱节”；“关于文学理论和马列主义美学问题的研究，尚处在令人极端不满的状态之中”；“文艺学和文学批评之间严重分离的现象还远远没有被克服过来。同理解艺术创作的本质和文学过程的规律性有关的那些基本理论问题，还研究得很不够。在许多著作中，连篇累牍地抄书、搬弄教条、反来复去地象书呆子那样背诵人所周知的真理，竟代替了创造性的研究。直到现在为止，否认艺术创作特点的庸俗社会学残余还时有发生。”^①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不能设想，“无冲突论”的问题一经提出之后，其影响就会荡然无存。事实表明，反“无冲突论”的过程，象任何事物的过程一样，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冲突的复杂过程。拿苏共十九大的总结报告来说，虽然它正确指出了“无冲突论”的危害所在，并提出了克服粉饰现实倾向的途径，但在某些问题上，同时又陷入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新泥潭，例如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典型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等，就是一种昔日“无冲突论”思潮的余波。一个作家塑造什么样的典型和怎

① 《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克服文艺学中的落后现象》，1953年6月9日。